

全真道研究

任詠題



第五輯

趙衛東 主編

山東師範大學全真道研究中心 主辦

齊魯書社

全真道研究

任繼愈題



常州大學圖書館
藏書章



第五輯

趙衛東 主編

山東師範大學全真道研究中心 主辦

齊魯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全真道研究. 第五輯/趙衛東主編. —濟南: 齊魯書社, 2016. 12

ISBN 978 - 7 - 5333 - 3689 - 9

I. ①全… II. ①趙… III. ①全真道—文集 IV. ①B956.3 - 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321681 號

全真道研究 第五輯

趙衛東 主編

主管單位 山東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齊魯書社

社 址 濟南市英雄山路 189 號

郵 編 250002

網 址 www.qlss.com.cn

電子郵箱 qilupress@126.com

營銷中心 (0531)82098521 82098519

印 刷 山東德州新華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開 本 720mm × 1020mm 1/16

印 張 17.25

插 頁 2

字 數 300 千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數 1—930

標準書號 ISBN 978 - 7 - 5333 - 3689 - 9

定 價 58.00 圓

《全真道研究》編委會

名譽主編

王柏堅 黃健榮

名譽副主編(按姓氏筆畫爲序)

周和來 林國柱 莫小賢 葉長清 趙球大 趙淑儀 鄭康勤 蕭炳強

顧問委員會(按姓氏筆畫爲序)

朱越利 任法融 牟鍾鑒 李養正 李豐楙 周立昇 胡孚琛 施舟人
卿希泰 陳耀庭 張繼禹 馮達文 蜂屋邦夫 熊鐵基 劉仲宇
鄭國強

主編 趙衛東

責任編輯(按姓氏筆畫爲序)

胡常春 秦國帥 張 琰 張 強 趙衛東

編輯委員會(按姓氏筆畫爲序)

王 卡 王宗昱 戈國龍 尹志華 李 剛 李大華 李永明 吳亞魁
何建明 松下道信 高萬桑 郭 武 陳廖安 孫亦平 張廣保
張澤洪 森由利亞 強 昱 蓋建民 詹石窗 趙衛東 鄭素春
樊光春 黎志添 劉 迅 劉固盛 盧國龍

刊頭題字 任法融

編者的話

《全真道研究》第五輯共有十三篇文章，這十三篇文章皆與全真道有關，按主題可以分為五類。

第一類四篇文章皆與內丹道有關。王崗《明代藩王與內丹修煉》一文，從內丹修習與入門儀式、內丹著作的編撰與刊刻以及詩賦論道等方面，探討了明代藩王與道門內丹的密切關係。王崗教授認為，明代藩王與內丹道的這一交涉並非某個地域的特殊情況，而是全國範圍的現象。明廷儘管實施了“藩禁”政策，藩王在地方上仍享有極高的威望，通過明代藩王的內丹實踐，可以看出內丹修煉對整個明代社會的巨大影響。戈國龍《論境界論視域下的返本還原》一文，從“金丹大道”“丹道層級”“神仙境界”和“生死超越”等幾個方面，討論了道教內丹學返本還原論的理論價值。梁淑芳《〈西遊原旨〉內丹思想初探》一文，從人物象徵與情節意涵、先天真一之氣、性命雙修之道等方面，對劉一明《西遊原旨》的內丹思想進行了研究。通過研究得出如下結論：劉一明的丹道理論以“先天真一之氣”為修行基礎，視性命雙修為總原則，既繼承了全真道龍門宗的傳統，又援引了南宗“先命後性”的主張。呂燁《醫療與修德：早期女丹文本的兩種面向》一文，深入探討了中醫學及中醫師在女丹功法記錄和文本發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並梳理出女丹傳統逐漸道教化的過程。通過研究認為，女丹文本的編輯過程雖展現了男性話語的主導權，在儒家倫理的框架下引導女性進行修煉，但女丹對於女性來說仍有治療身體疾病和培養德行兩種面向，同時兼顧了道教仙傳的角色。

第二類四篇文章是關於全真道教史的研究。張廣保《元代嵩山崇福宮的全真教傳承》一文，依據碑刻宮觀山志等材料，對蒙古國時期嵩山崇福宮轉入全真教及其宗派傳承等問題進行研究，指出蒙古國時期全真教高道中有兩位棲雲真人，且都曾師承丘處機，都出生於山東且年代接近，都在河南一帶弘道。章偉文

《鍾離權與早期全真道歷史承傳關係略述》一文，主要就道教神仙人物鍾離權與金元時期北方全真道派之間的承傳關係進行了考察，從而得出王重陽所開創的全真道與道教史上以鍾離權、呂洞賓為代表的鍾呂金丹派之間存在密切關聯的結論。宋學立《早期全真教以史弘道的教史思想——以〈甘水仙源錄〉〈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七真年譜〉為中心》一文，通過文獻對比的方式，以全真教史家李道謙創作的《七真年譜》《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甘水仙源錄》三部教史文獻為核心，對這一時期教史文獻的創作特徵進行了考察。尹志華《清代全真道傳戒若干史實再考察》一文，主要探討了以下三方面問題：1. 根據康熙時文人王灃、郝浴、沈季友、詹賢等人的記述，確定王常月其人的存在以及傳戒的真實性。根據果親王允禮的題詞，證實康熙皇帝曾賜給王常月紫衣。2. 王常月徒孫詹太林之後全真道大規模傳戒活動中斷的原因。3. 日本學者吉岡義豐所製作的關於北京白雲觀嘉慶以降傳戒譜系的兩個表格有錯誤，並且遺漏了長教玄、孟教齡、嚴永寬三位律師的傳戒。

第三類三篇文章研究的主要是全真道人物或宗派。郭武《陳復慧與蘭台派——兼談清代四川全真道與地方社會之關係》一文，通過討論與陳復慧及其所創“蘭台派”有關的史料，從一個側面揭示了清代四川全真道的發展狀況及其與地方社會的關係。趙衛東《丘處機與〈攝生消息論〉》一文，通過對《攝生消息論》中所引文獻的詳細考察，發現它實際上並非一部原創性作品，而是對金代以前的養生文獻，尤其是與四季養生有關的養生文獻的彙編。並認為，雖然還沒有確鑿證據證明《攝生消息論》與丘處機有直接關聯，但無論是從所引文獻皆出於金代以前，還是從偏重於老年養生的特點來看，其與丘處機有許多相契合的地方。張雪松《高仁峒年譜簡編及相關考證》一文，對高仁峒的生平事跡進行了詳細考證，最後他認為，高仁峒在晚清與內廷太監、慈禧太后關係密切，許多王公貴胄都交接於他，俄國、日本使節也對他多有矚目。晚清“后黨”多與高仁峒關係密切，這招致“帝黨”中人物的許多非議，社會上對高仁峒的謠言頗多，甚至還被寫入《孽海花》等小說之中。“帝黨”中梁啟超等人對佛教頗有好感，而對道教多有惡評，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近現代學術對道教的態度，高仁峒或許要為這一“偶然”事件承擔一定責任。

第四類兩篇文章以全真道與地方社會關係為主題。吳真《龍虎之爭：帝國晚期華北地方社會的佛道宗教格局》一文，對河南省鶴壁市濬縣浮丘山和大伾山宗教格局的變遷進行了考察，尤其集中於明代中葉碧霞宮帶來的變革，並由此對帝國晚期華北地方社會信仰史進行了討論。宋建明、秦國帥《全真教與地方社會中



的鄉紳、士族、國家祀典——以雲行山爲中心的考察》一文，主要運用現存碑刻資料和方志文獻，對山東省淄博市博山區雲行山道教與地方社會的關係進行了考察。明清民國時期，雲行山建立了玉皇殿、三清廟、三教祠、關帝殿、忠義祠、呂祖廟和十大夫廟等共計七座廟宇或殿祠，全真道士李太住、馬一仲、張元席等曾住持其中，而且他們與地方士紳和富姓大族保持了良好的互動關係。



目 錄



編者的話 /1

明代藩王與內丹修煉 /王崗著 秦國帥譯 1

論境界論視域下的返本還原 /戈國龍 20

《西遊原旨》內丹思想初探 /梁淑芳 41

醫療與修德:早期女丹文本的兩種面向 /呂 燁 59

鍾離權與早期全真道歷史承傳關係略述 /章偉文 82

元代嵩山崇福宮的全真教傳承 /張廣保 95

早期全真教以史弘道的教史思想

——以《甘水仙源錄》《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七真年譜》為中心

/宋學立 106

清代全真道傳戒若干史實再考察 /尹志華 128

陳復慧與蘭台派

——兼談清代四川全真道與地方社會之關係 /郭 武 145

丘處機與《攝生消息論》 /趙衛東 155

高仁峒年譜簡編及相關考證 /張雪松 174

龍虎之爭:帝國晚期華北地方社會的佛道宗教格局 /吳 真 198

全真教與地方社會中的鄉紳、士族、國家祀典

——以雲行山為中心的考察 /宋建明 秦國帥 216

《全真道研究》徵稿啓事 /263

明代藩王與內丹修煉

□王崗著 秦國帥譯

摘要：本文著眼於明代宗藩這一特殊的貴族階層，從社會史的角度，來探討內丹修煉的社會文化意義。明代藩王對整個明代的政治、經濟、軍事和國家禮儀都具有重大影響。本文從內丹修習與入門儀式、內丹著作的編撰與刊刻，以及詩賦論道諸方面探討了明代藩王與道門內丹的密切關係。這一交涉並非某個地域的特殊情況，由於藩王分封於全國各地，所以是全國範圍的現象。明廷儘管實施了“藩禁”政策，藩王在地方上仍享有極高的威望，通過對明代藩王內丹實踐的考察，本文認為內丹修煉對整個社會有巨大影響，這也是一個文化史的課題。

關鍵詞：藩王 藩禁 內丹 丹經 丹詩

作者簡介：王崗(Richard G. Wang)，男，1962年出生於上海，美國芝加哥大學(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哲學博士。曾任教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系、中文系，美國索思摩大學(Swarthmore College)現代語言文學系，現在美國佛羅里達大學(University of Florida)任教，為語言文學文化系終身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及宗教系終身副教授。研究方向為明代道教、宗教與中國文學研究、明清神魔小說與宗教。代表學術成果包括：*The Ming Prince and Daoism: Institutional Patronage of an Elite*、*Ming Erotic Novellas: Genre, Consumption and Religiosity in Cultural Practice* 以及《浪漫情感與宗教精神——晚明文學與文化思潮》等專著，“Qiyunshan as a Replica of Wudangsha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Religious Landscape of the Ming Empire”、《明代江南士紳精英與茅山全真道的興起》、“A Local Longmen Lineage in Late Ming—Early Qing Yunnan”以及“Four Steles at the Monastery of Sublime Mystery(Xuanmiao guan)”等論文。



明代宗藩是一個特殊的貴族階層，對整個明代的政治、經濟、軍事和國家禮儀都具有重大影響。^①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了一種分封制度，授予他的兒子們親王的頭銜，並將他們冊立在帝國的要塞以拱衛（“藩屏”）朝廷。根據明代的“封建”傳統，除太子外，皇帝所有的兒子都稱親王。親王嫡長子為世子；其他的兒子則被授予郡王這一較低的頭銜。相應地，郡王嫡長子為郡王世子；其他的兒子和後裔則被授予級別更低的頭銜將軍或中尉。自永樂時始，將軍相當於文官官品的從一品到從三品，中尉相當於從四品到從六品，換言之，他們相當於文官官品體系中的中高級別。嚴格來說，藩王指的是親王，其餘朱氏皇族成員則是皇族宗人，可統稱為“宗藩”。但親王與郡王、將軍、中尉等宗藩成員的差別僅在於爵位的高低，其間並無本質的不同。為行文方便起見，本文中的藩王是在廣義上使用，包括親王、郡王以及較低級別的王府成員。之所以使用藩王一詞來指稱這些較低級別的宗室，是因為，這些較低級別的宗室成員在明代（清代資料對此也有所反映）有時被稱以他們本身的爵位，有時則稱為“宗室”“宗侯”或“王孫”，而有時則直截了當地被稱為某一藩府之“王”。^②

筆者在他處已論證了明代藩王與道教密不可分的聯繫。^③ 就內丹修煉來說，也值得我們去研究。自永樂後期以降，明廷實施了旨在削弱藩王政治、軍事等權力的“藩禁”政策，大大限制了藩王。^④ 儘管如此，藩王無論“在權威和聲望上”還

① 對明代宗藩的研究成果甚夥，代表著述見布目潮瀨：《明朝の諸王政策とその影響》，載氏著：《隋唐史研究：唐朝政權の形成》，京都：同朋舍，1979年，第385～494頁；顧誠：《明代的宗室》，載《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9～111頁；張德信：《明代諸王分封制度述論》，載《歷史研究》1985年第5期，第76～91頁；佐藤文俊：《明代王府の研究》，東京：研文出版社，1999年；Richard G. Wang（王崗），*The Ming Prince and Daoism: Institutional Patronage of an Elite, Ming Erotic Novellas*,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Craig Clunas, *Screen of Kings: Royal Art and Power in Mi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3。

② 例如，可參見《（道光）陽曲縣志》，1.23a。在此，晉藩的兩位成員朱新塲和朱新祚，雖非藩王而僅為低等的宗室貴族，却被稱為“晉藩王”。

③ Richard G. Wang, *The Ming Prince and Daoism*；王崗：《明代遼王的荊州崇道活動及其政治命運》，載王崗、李天綱主編：《中國近世地方社會中的宗教與國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201～229頁。

④ 吳緝華：《明代制度史論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3年，第43～47、283～290頁；張德信：《明代諸王分封制度述論》，第81～82、91頁；張顯清：《明代親藩由盛到衰的歷史演變》，載《社會科學戰線》1987年第2期，第171～173頁；暴鴻昌：《明代藩禁簡論》，載《江漢論壇》1989年第4期，第53～56頁；顧誠：《明代的宗室》，第94～95頁；布目潮瀨：《明朝の諸王政策とその影響》，第429～442頁；佐藤文俊：《明代王府の研究》，第77、199頁。

是“在禮儀和社會地位方面都要高出於文官”。^① 特別在地方上,明代藩王仍享有極高的威望,其封地也因有藩王存在而具有強烈的地方自豪感。由此可見明代藩王的內丹修煉對整個社會的影響(見表1)。

表1 明代從事內丹修煉藩王及其王府所在地

明代從事內丹修煉藩王	王府所在地
慶王	寧夏
瀋王	長治(潞州府)
趙王	安陽(彰德府)
伊王	洛陽(河南府)
魯王	滋陽(兗州府)
周王	祥符(開封府)
唐王	南陽
秦王	西安府
襄王	襄陽
遼王	江陵(荊州府)
荆王	蘄州
寧王	南昌
谷王	長沙
渭王	零陵(永州府)
岷王	武岡
蜀王	成都
靖江王	臨桂(桂林府)

^① Edward L. Farmer, *Early Ming Government: The Evolution of Dual Capitals*, Cambridge, Mass.: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76, p. 58; Edward L. Dreyer, *Early Ming China: A Political History 1355—143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68, 150 ~ 151. 同時亦可參見 Charles O. Hucker, “Ming Government”,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8: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eds. Frederick W. Mote and Denis Twitche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9.

一、內丹修習與入門儀式

對明代藩王道教支持活動的調查，應當首先從他們道教身份認同的性質出發。這種認同包含幾個層面。明代的一些藩王接受道教授籙而成爲道士，其他一些藩王則參與道教科儀，還有一些藩王則親身從事道教修煉。據記載，從事道教修煉的藩王所實踐的是內丹、外丹或其他修煉術。令人驚訝的是，第一代藩王即明太祖的兒子們，在其留下來的道教修煉史跡中，他們往往親自煉製外丹或服食丹藥而甚少修煉內丹。這一現象需要進一步的解釋。衆所周知，較之全真道，太祖要更加支持正一道。他得出結論，“全真務以修身養性，獨爲自己而已”，而正一道士則“專以超脫”即專爲地方社區的所有參與者舉行薦亡和普度儀式。對他來說，正一道儀式“特爲孝子慈親之設”，能够敦孝慈、益人倫、厚風俗，“其功大矣哉！”這是他偏愛正一道的原因之一，因而相應地，正一道在明朝道教中也佔據著主導地位。^① 另一個原因可能在於太祖的民族主義考慮。到了明初，在一般人心目中，內丹已主要由全真道來代表。全真教在元代時則受蒙古統治者青睞。而對以“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爲己任的明太祖來說，他對全真教與蒙古的聯盟頗爲不屑。^② 雖然太祖的這些考慮僅僅是其宗教思想而非國家的宗教政策，但他關於全真與正一的觀念還是影響了後繼皇帝及明太祖的兒子們，也有可能影響了官方的思維路線。^③ 因此，我們可以推測，受太祖及官方對全真教立場的影響，太祖的兒子們可能會對非內丹式的修煉方式更爲熱衷。

① 卿希泰：《中國道教史》（修訂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卷，第434～435頁；曾召南：《明代前中期諸帝崇道淺析》，載《四川大學學報》1991年第4期，第97頁；Pierre-Henry de Bruyn, “Daoism in the Ming”, in *Daoism Handbook*, ed. Livia Kohn, Leiden: Brill, 2000, p. 611; John Lagerwey, *Taoist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and History*, New York: Macmillan, 1987, p. 260. 引文出自明太祖《御製玄教立成齋醮儀文序》。

② 關於此點，亦可參見陳兵：《明代全真道》，載《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1期，第42～43頁；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第3卷，第463頁；張應超：《明朝皇帝與道教》，載張中正主編：《第五屆中國明史國際學術討論會暨中國明史學會第三屆年會明史論文集》，合肥：黃山書社，1994年，第407頁。有關明太祖民族主義舊制恢復的討論，參見 Edward L. Farmer, *Early Ming Government: The Evolution of Dual Capitals*, pp. 36～40.

③ 關於明代高官認同明太祖對全真道與正一道的理解方面，參見許贊：《明故禮部尚書清微妙濟守靜修真凝玄衍範志默秉誠闡教輔國致一真人贈少師謚文康榮靖邵公墓誌銘》，載邵元節：《賜號太和先生全集》，《故宮珍本叢刊》據明嘉靖十八年（1539）刊本影印本，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4. 15a；錢謙益：《初學集》，載氏著：《錢牧齋全集》卷七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602頁。當嘉靖十八年（1539）撰寫邵元節的墓誌銘時，許贊（1473—1548）爲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從一品）。錢謙益（1582—1664）當然是明末及南明時期的文壇和朝臣領袖。



當然，並非沒有例外。有位第一代藩王因其外丹方面的嘗試而為人所知。湘王朱柏（1371—1399）嘗受錄入道。^① 在他赴國就藩湖廣荊州府之前，在洪武十七年（1384）就已經因為修煉外丹而頗有聲譽。^② 不過，他在內丹修煉方面亦為人所認可，來復（1319—1391）《題湘王紫虛丹室四首》詩之四即稱述朱柏：“一室虛遊別有天，內丹精煉得真傳。”^③ 在第一代藩王中，封地位於江西南昌府的寧獻王朱權（1378—1448）必須一提。朱權極有可能接受過道教傳度，並隨後成為一名淨明道士。他曾移居西山天寶洞，並在那裏修煉道術。他還曾暫住夢山石室以進行修煉。不過，這些關於他修煉的描述都相當模糊，沒有提供任何關於其修煉方式之性質的線索。^④ 在道教史上，朱權撰著並製作了許多重要的道教著作。但他很少深入地討論或記載內丹技術與內丹實踐。^⑤ 不僅如此，由於他還曾編纂過兩部或更多的外丹著作，且其中的《庚辛玉冊》八卷頗為重要，這一事實也促使一些學者認為，“朱權一定建有一個煉丹實驗室，用以操作或監督醫藥化學、藥物學以及冶金術等方面的實驗”，也即外丹。^⑥ 依據這種論證，一般認為，朱權的修煉活動極有可能是與外丹或其他長生術相關，而非內丹。^⑦ 不過，朱權並非完全沒有內丹著作，據記載，他撰有《內丹節要》與《命宗大乘五字訣》，二書合為一卷，後者似乎是有關內丹的南宗法門，祇可惜未見傳本。^⑧ 確切的證據來自其文學作品，朱權在其作品中好尚並表現內丹修煉，如其存世神仙道化劇《沖漠子獨步大羅天》中，主角道士皇甫壽號沖漠子（“皇”隱喻皇家，“壽”代表長壽）即影射朱權本人。劇中屢屢提到“將《悟真篇》傳與了沖漠子”和“心猿意馬、酒色財氣都與

① 關於朱柏受錄的詳情，見 Richard G. Wang, *The Ming Prince and Daoism*, p. 45.

② 吳伯宗：《榮進集》（《四庫全書》本），3. 16a ~ b。其中，所用的術語是“丹砂”。

③ 來復：《蒲庵集》，六卷本，載《禪門逸書初編》，臺北：明文書局，1980年，第七冊，據洪武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刊本影印，3. 79b。

④ 關於此點，見 Richard G. Wang, *The Ming Prince and Daoism*, pp. xv—xvi, 44.

⑤ Kristofer M. Schipper and Yuan Bingling, “Tianhuang zhidao taiqing yuce”, in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eds., Kristofer M.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p. 948.

⑥ Joseph Needham, Ho Ping-yü (Ho Peng Yoke), and Lu Gwei-djen,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5.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210. 亦可參見姚品文：《寧王朱權》，西雅圖：藝術與人文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122頁。關於朱權外丹著述的討論，參見 Needham et al.,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5.3:210—12；何丙鬱、趙令楊：《寧王朱權及其庚辛玉冊》，香港：香港大學中文系，Brisbane: School of Modern Asian Studies, Griffith University, 1983年，第11 ~ 24頁；Ho Peng Yoke, *Explorations in Daoism: Medicine and Alchemy in Literature*, eds. John P. C. Moffett and Cho Sungwu, London: Routledge, 2007, pp. 84 ~ 95.

⑦ Kristofer Schipper and Yuan Bingling, “Tianhuang zhidao taiqing yuce”, p. 948.

⑧ 姚品文：《寧王朱權》，第365頁。

他除去了”。^① 前者是內丹經典，後者“心猿意馬”“酒色財氣”則是全真道的關鍵修煉術語，這說明他對內丹並不隔膜。

與前期藩王不同，對於後期藩王來說，他們更感興趣的是內丹，或者結合了內、外丹於一體的修煉術。這一點也契合了文人對內丹術日益增長的興趣。如在寧藩，由於受朱權的影響，許多寧藩宗室成員都是奉道者。如寧藩瑞昌王府輔國將軍朱拱樹（1511—1583）就信奉道教，並修煉內丹和外丹。據王世貞（1526—1590）《瑞昌王府三輔國將軍龍沙公暨元配張夫人合葬誌銘》記載，朱拱樹“習養生，然不事服餌、御內、烹煉之術，超然有諧於《參同》《悟真》之微指者”^②。顯然，朱拱樹深得《參同契》和《悟真篇》的內丹之旨。同樣，他的兒子奉國將軍朱多煌（1534—1593）也修習內丹。^③

封於山東兗州府的魯憲王朱壽鉉（？—1636）晚年好道，並從事道教修煉。^④ 他的侄子魯王朱以派（？—1642）在仍為親王世子時，分別於天啓七年至崇禎三年（1627—1630）間和崇禎三年（1630）邀請道士龜世籙和盧丹金居於其王府之中，並向他們學習內丹知識。^⑤ 在襄藩，分封於湖廣襄陽府的棗陽恭靖王朱厚燭（1561—1593 在位）居於其花園而非王府之中達二十年從事內丹修煉。^⑥ 而在封於湖廣永州府零陵縣的岷藩支系南渭王府中，在南渭莊順王朱譽樞（1547—1560 在位）死後，鎮國將軍、南渭王府宗室管理朱譽樞就在其零陵縣的府第中修建了迎仙館，邀請修道煉丹之士蔣鏊館居其中，並從其研習內丹術及道教教法。^⑦ 蔣鏊是正德八年（1513）舉人，並相繼被任命為廣東某縣教諭及河南扶溝縣令。但他晚年棄官修道，成了一名家喻戶曉的遊方異人，其弟子包括著名文學家藝術家

① 朱權：《沖漠子獨步大羅天》，載陳萬鼎主編：《全明雜劇》，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第三冊，第907、908、910、913～914、917頁。關於朱權在其雜劇中所展現的對於內丹的興趣，參見姚品文：《寧王朱權》，第120～121頁。

② 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據明崇禎刊本影印，10.10b～11a, 16.18b, 111.6b～8a；劉鳳：《子威先生澹思集》，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年刊本縮微膠片，4.11a～b；余日德：《余德甫先生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8.1b。王世貞文引文見《弇州山人續稿》，111.6b～8a。

③ 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10.10b～11a；172.8b, 10b, 20b。

④ 張岱：《陶庵夢憶》，載氏著：《陶庵夢憶·西湖夢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9頁。

⑤ 朱以派：《遇仙圖紀略》，載吳本泰：《東瞻集》，收入吳本泰：《吳吏部集》（《四庫禁毀書叢刊》本），3b；吳本泰：《東瞻集》，2b～3a。

⑥ 吳國倫：《甌黿洞續稿·詩集》（《續修四庫全書》本），4.20b～21a。

⑦ 隆慶《永州府志》，8.7b。當親王或郡王去世或被奪爵時，藩府被指定的宗室管理（又稱“管理府事”）就充當起了藩王的角色。

徐渭(1521—1593)及其兄徐淮(1492—1545)。^① 朱譽樞的尊奉蔣鑒，自然是爲了內丹等道教修煉法門。

封於湖廣黃州府蘄州的荆藩樊山王朱翊鉅(1568—約1628)自詡與道教“夙有遠緣”，喜談道教“玄言”(或“玄學”“談玄”)，“參討玄牝義”。他也渴望一種隱士的生活，“自許吾身求隱道”，在其府中雲集了衆多的僧道朋友。他與好幾位道教內丹大師保持著良好的關係，其中包括葉煉師、李芄、南京的張梓以及馬道士等，朱翊鉅非常仰慕他們的道行，並表達了跟隨他們修道的意願。朱翊鉅還屢次提及他的道教修行實踐，還自“鑄金丹”，稱“我欲烹砂成素雪”“瑤爐丹藥燦成霞”。在其《贈葉煉師》詩即云：“豈知妙法元無累，說到神丹亦在修。水激金晶飛肘後，氣蒸玉液到心頭。”他還多次用“大藥刀圭不計年”這樣的詩句。金晶、飛肘、玉液皆爲內丹術語，這顯然是說內丹修行。他也曾向友人何天遊、李汝善“劇談金丹返還之理”。他聲稱，這些修煉方式可以讓人“精神大完足，筋力妙躋攀。既無煩念出，復已塵欲緣”，不再有任何的世俗欲念。不僅如此，通過掌握道教玄秘和大藥，他還期待自己“那能再遇胡麻飯”，想象自己終有一天會“高揖謝人寰”，“何當大藥都成就，共入虛無自在春”，能够升天朝真。最後，朱翊鉅還“爲母妃禮斗閉環”。^② 閉環即道教特別是全真道的環堵修道之法，指修道者自我關閉在環堵裏，也即所謂閉關，在限定的時間內靜坐苦行修煉。^③ 在環堵成爲全真道制度化的修行方式後，往往指儀式化的內丹修煉。^④ 環堵坐法在明代依然廣爲流行，爲全真

① 有關對蔣鑒的研究，參見周建剛：《分裂的世界：明代零陵名士蔣湘崖事略考》，載《湖南科技學院學報》第35卷第3期，2014年，第47～52頁；梁一成：《徐渭的文學與藝術》，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第174～175頁。

② 朱翊鉅：《廣謙堂集》，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藏，據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崇禎元年樊山王府刊本的複製副本，1. 10b～17a；2. 8a～b，13b，21b～22b；3. 1a～b；6. 17b；7. 21a～b；10. 15a～b；11. 27a～b；12. 4b～6b；13. 3a～b，5a，21a，26a；14. 11b，13b～14a，17a～18b；15. 9a～b，24a；21. 14a～b；22. 17a～b，19b～20a；23. 10a，16a～b，19a；24. 1a～5a。引文見14. 13b～14b，7. 21a～b，14. 11b。

③ 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對環堵作了最爲詳盡的研究，見Vincent Goossaert: *La Création du Taoïsme Moderne: L'ordre Quanzhen*, Ph. D. diss.,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1997, pp. 171～219；高萬桑：《全真道的環堵考》，載盧國龍編：《全真道集：全真道——傳承與開創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青松出版社，2004年，第143～156頁；Vincent Goossaert, “Entre quatre murs. Un ascète taoïste du 12e siècle et la question de la modernité”, *T'oung Pao*, 85 (1999), pp. 413～414；“The Invention of an Order”, pp. 126～128；“Starved of Resources: Clerical Hunger and Enclosure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2.1 (2002), p. 77.

④ Goossaert, *La Création du Taoïsme Moderne*, pp. 176～92, 217；《全真道的環堵考》，第144～154頁；“Entre quatre murs,” pp. 413～414；“The Invention of an Order,” pp. 126～127.

道的基本修行法之一。^① 鑒於上述朱翊鉅對內丹修行的投入，這裏的“閉環”當指內丹修煉。甚至欽州府知府張國華還是朱翊鉅的“玄修”門人。^②

封於荊州府的遼潛王即末代遼王朱憲燁(1525—1582?)“酷愛道家之說”，是一位虔誠的道教徒。他似乎經過授籙儀而皈依了清微派。筆者對他處已做了個案研究。^③ 與本文有關的是，朱憲燁還執著於煉丹，包括內丹修煉，還熟知《悟真篇》《周易參同契》。^④ 他在詩中就自述：“有藥身中登壽域”，“靜時須究《參同契》”。^⑤ 同在遼藩，光澤榮端王朱寵灃(1475—1546)之孫朱儼鐘(約1643—1653年前後在世)晚年崇真“尚道”，進入入道，成了一名真正意義上的道士，時人稱之為“道長”或“伯靡道長”。他似乎對道教內丹或內煉特別感興趣。^⑥

朱約佶(1499?—1584?)，號雲仙，是封於廣西桂林府的靖江端懿王朱約麒(1475—1516)的兄弟或堂兄弟，以內丹著稱。他在內丹修行方面的成就還為諸多文人所推崇。^⑦ 而且，在內丹教法方面，他尊古光先生為其師，而納謝應奎為其徒。^⑧ 更有甚者，明代16世紀文壇盟主王世貞還迫切地表達了他欲尊朱約佶為其內丹導師的願望。^⑨ 極有可能，朱約佶曾受度並加入到一個內丹法派當中，至少，在古光先生、朱約佶及謝應奎之間，有一種與在道教中類似的正式傳授程式。這說明朱約佶的內丹修煉已不僅是個人行為，而且是一個教團的集體活動。

① Goossaert, *La Création du Taoïsme Moderne*, pp. 205 ~ 213; 《全真道的環堵考》，第152 ~ 154頁；“Entre quatre murs”，p. 414；“The Invention of an Order”，pp. 126 ~ 127；王崗：《明代江南士紳精英與茅山全真道的興起》，載《全真道研究》第二輯，濟南：齊魯書社，2001年，第45 ~ 47頁。

② 朱翊鉅：《廣謙堂集》，2. 21b ~ 22b；3. 1a；5. 8a；7. 3a ~ b，21a ~ b；10. 17b；12. 5a ~ b；14. 11b，13b ~ 14b；15. 18b。引文見14. 13b ~ 14b，7. 21a ~ b，14. 11b。

③ 王崗：《明代遼王的荊州崇道活動及其政治命運》，第212 ~ 217，219 ~ 221，225，227 ~ 228頁。

④ 朱憲燁：《種蓮歲稿》，芝加哥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五年刊本縮微膠片，1. 2a，14a，20a ~ b；2. 7b，11a；4. 14b ~ 15a，18a；5. 20a，27b；6. 11b ~ 12a，21a ~ b；朱憲燁：《種蓮文略》，明嘉靖三十二年原刊，附於《種蓮歲稿》之後，1. 17a，19b，21a ~ 22b，27b ~ 28a；2. 10a ~ b，24b ~ 25a，27a。

⑤ 朱憲燁：《種蓮歲稿》，1. 20a ~ b；《種蓮文略》，1. 21a ~ b。

⑥ 朱儼鐘的《江陵志餘》中，收錄了章戴煥、徐圻、潘鏞和黃光業等給他的贈詩。章戴煥和徐圻詩中皆稱朱儼鐘為“道長”，潘鏞詩中稱他為“道兄”，而黃光業詩中則描述朱儼鐘“尚道”。見朱儼鐘：《江陵志餘·再續贈言》，載氏著：《江陵志餘》（《中國地方志集成》，據清順治七年鈔本影印，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第393頁。有關朱儼鐘的研究，見王崗：《明代遼王的荊州崇道活動及其政治命運》，第211頁。

⑦ 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172. 4b，6a，23a ~ 24b；王世懋：《王奉常集·詩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12. 2b；王世懋：《王奉常集·文集》，45. 22b ~ 23a。

⑧ 朱約佶：《觀化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本）；袁福徵：《觀化集序》，載《觀化集·序》，3b；羅洪先：《觀化集敘》，載《觀化集·序》，1b ~ 2a；沈應魁：《觀化集敘》，載《觀化集·序》，17b；嘉慶《臨桂縣志》，3. 10b，20. 10b ~ 11a。

⑨ 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172. 23a ~ 24b。

在這一方面，分封於湖廣長沙府的吉藩中的吉王世子朱常淳最值得我們關注。朱常淳（法名太和，約1557—1632前後在世）被視為全真道某支龍門派的第九代弟子。作為此系龍門派的宗師，伍守陽（1574—1643）自萬曆四十一年（1613）起居於吉王府中，朱常淳師事之。^① 實際上，朱常淳似乎是伍守陽最早也最為重要的弟子，因為伍守陽大多數的著作都是對朱常淳所提內丹修煉問題的回應。^② 早在萬曆四十一年起，伍守陽就開始回應朱常淳的問題。兩年後（1615），他首次正式傳授給朱常淳內煉秘訣《百日煉精口訣》。天啓二年（1622），他第二次向朱常淳傳授修煉秘訣，此即《采大藥口訣》。崇禎元年（1628），他傳授給朱常淳《五龍捧聖口訣》，亦稱《大藥過關口訣》。最後，崇禎五年（1632），他將自己的著作《仙佛合宗語錄》以及龍門派一起傳給了朱常淳。^③

由於對學道以及修煉的執著投入，朱常淳甚至不願再繼承王位。萬曆四十六年（1618），由於他的父親在之前一年去世，他此時本應繼承王位，但他詐死，獲得了吉憲王的謚號，並安排他的兒子在天啓元年（1621）繼承了王位。^④ 如果我們相信《鉢鑒續》以及伍守陽弟子謝太易所作其師傳記中的記載屬實的話，那麼，伍守陽隨後由於擔心他所製造的麻煩的後果，“恐有禍及”，而從吉王府逃往天台山。^⑤ 鑒於他之前一直非常安全，那麼，他在萬曆四十五年（1617）後又製造了什麼麻煩呢？筆

① 伍守陽：《天仙論語仙佛合宗》（《藏外道書》本），1. 1a ~ b, 4. 44b; Monica Esposito, “The Longmen School and Its Controversial History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in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ed. John Lagerwey,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2004, p. 655. 這位法名為太和的吉王朱常淳曾被一些學者分別誤認為是朱由棟（1621—1636在位）和朱慈烺（1639—？在位）。實際上，朱由棟和朱慈烺分別是朱常淳的兒子和孫子。

② 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第4卷，第40~41頁。

③ 伍守陽：《天仙論語仙佛合宗》，1. 1a ~ 26b, 4. 42a ~ 46b; 伍守陽：《仙佛合宗語錄》，載《重刊道藏輯要》畢集1, 1a ~ 41a; 伍守陽：《天仙正理直論增注》，《重刊道藏輯要》畢集4, 21a ~ b, 33b ~ 34a, 58b ~ 59a; 伍守陽：《天仙正理淺說》，《重刊道藏輯要》畢集5, 1b ~ 2b, 14a ~ 19a, 20b ~ 21b; 伍守陽：《伍真人丹道九篇》，《重刊道藏輯要》畢集6, 20a, 22a ~ 37a; 閔一得：《金蓋心燈》（《藏外道書》本），2. 1b; 傅金鉉：《天仙正理讀法點睛》（《藏外道書》本），21a; 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第4卷，第40~41頁; 森由利亞：《全真教龍門派系譜考》，載道教文化研究会編：《道教文化への展望》，東京：平河出版社，1994年，第208頁注59。《道藏輯要》中收入的《仙佛合宗語錄》題為《伍真人丹道九篇》。《道藏輯要》中題為《仙佛合宗語錄》的著作實際上是另一種不同的文本，記錄了伍守陽與其弟子的對話。

④ 關於朱常淳的信息，參見伍守陽：《天仙論語仙佛合宗》，1. 1a ~ b; 乾隆《長沙府志》，10. 11a; 嘉慶《長沙縣志》，15. 9a ~ b; 張廷玉：《明史》第104卷，第2922頁。儘管非法，但通常的做法是，明代許多王府並未如實向朝廷彙報藩王的死訊，其目的就在於繼續收受國家的宗祿。參見樊譽：《明代宗室的戶籍管理》，載《滄桑》2007年第3期，第8頁。朱常淳的情形則相反，他在世時便向朝廷報告了自己的“死亡”。

⑤ 《鉢鑒續》及謝太易《伍守陽大傳》，轉引自閔一得：《金蓋心燈》，2. 1b ~ 2a。莫尼卡（Monica Esposito）認為，《鉢鑒》有可能是一部偽託王常月（？—1680）作的虛構著作，並不存在。如果此一情形屬實的話，那麼《鉢鑒續》的性質可能亦是如此。參見Esposito, “The Longmen School”, p. 622.